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ensions in Japan-US Relations and
Japan's Rise as a Major Power, 1980-1989

日美政治经济摩擦与 日本大国化

以 20 世纪 80 年代为中心

何晓松 著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ensions in Japan-US Relations and
Japan's Rise as a Major Power, 1980-1989

日美政治经济摩擦与 日本大国化

以 20 世纪 80 年代为中心

何晓松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数据

日美政治经济摩擦与日本大国化：以 20 世纪 80 年代为中心 / 何晓松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11
ISBN 978 - 7 - 5097 - 7473 - 1

I. ①日… II. ①何… III. ①日美关系 - 研究
IV. ①D831. 32 ②D871.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2853 号

日美政治经济摩擦与日本大国化 ——以 20 世纪 80 年代为中心

著 者 / 何晓松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王玉敏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王玉敏 高 靖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际出版分社 (010) 59367243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 ssap. com. 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0.5 字 数：325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473 - 1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无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典的冷战岁月，还是在这经典冷战早已过去但冷战要素仍颇有遗存的当今时代，日美同盟都构成东亚西太平洋国际政治基本体系中一大常在的变量，也因此始终在非同小可甚或至关紧要的程度上，影响和参与规定中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中国需要尽可能充分地了解和透视日美同盟的往昔历史、现今状况乃至未来趋向，从而相应地有助于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制定、贯彻和调整。

就日美同盟的历史而言，它既历经发展和显著强化，也历经曲折甚而内在危机。我们面前的《日美政治经济摩擦与日本大国化》一书主要探究后者，特别是探究堪称日美同盟最困难时期的 20 世纪 80 年代期间两国的严重对抗。当时，这两大伙伴间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日本国内被美国视为保护主义的种种特殊规制与美国倡导和主持的自由国际主义霸权规则两相碰撞，其实质可以说是与日美各自基本经济利益之争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日美基本经济方式和经济哲学之争：日本坚持日式资本主义，其特征为政府显著协调甚至局部主导国民经济，并尊奉传统等级制组织规则；美国则崇信和大力推广美式资本主义，其核心为尽可能完全的自由市场、个人主义和自由民主制。

不仅如此，日本经济的强劲崛起和“喧宾夺主”之势令美国面临前所未有的经贸挑战，从而导致美国相当强烈地意欲“敲打日本”。此外，日本经济崛起后难免企求政治/军事大国化，美国对日控制与日本对美反控制的矛盾由此愈益严重。这进一步加深了美国对日的恐惧，同时驱使美国更加着力去“敲打日本”。还有，关于同盟成员各自责任问题上的愈益深化的歧异，给日美矛盾火上浇油。至此，日本战后的社会共识是轻军备、

重经济的“吉田路线”，在国际安全事务上大抵免费搭乘美国便车，推卸在华盛顿看来必须随经济复兴和腾飞而相应加大的责任——出力维护美国霸权秩序的责任，日美矛盾由此更为加剧。

《日美政治经济摩擦与日本大国化》一书将 20 世纪 80 年代界定为日美关系及日本国家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转折期。其间，美国转变对日政策，从战后只送“胡萝卜”转为“胡萝卜加大棒”。在日本方面，实现经济大国化后，愈益倾向于扬弃战后多年的吉田路线，推进政治大国化乃至军事大国化，甚至像日本权势精英集团内的某些要人来说，“脱离美国的独立自主道路”应当是日本要争取的新方向。美国对日敲打侵蚀了两国间主仆关系的心理基础，促使日本多少改换对美从属心态，日本战后权势精英集团内的民族主义及其社会影响随之兴起。

到头来，20 世纪 80 年代的日美争斗有了个复杂的胜负决定。日美贸易大摩擦由美国发动，进而发展为两国间的（用该书作者的话说）政治体制摩擦。美国的很大部分经济目的是保护自己在世界生产体系中的领导地位，为自身的产业升级争取时间。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经济重新大振兴，而日本经济开始严重走低；再加上美国当时异常显赫的世界政治优势，导致日本无从奢望日美较为平等。然而，战后日本毕竟已在大国化方面迈出了几大步，特别是中曾根首相打出“战后政治总决算”旗号，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增进军备，力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推进日本的“正常国家化”，即政治/军事大国化。在此须着重指出：这个趋向，到中国强劲崛起之后，总的来说符合美国的东亚西太平洋大战略利益，因而得到华盛顿的愈益显著的鼓励和推进；然而，它迟早也将加深与美国的另一些重要利益的矛盾。

关于日美贸易摩擦，近几年出现了几部较好的著作，试图从其中揭示和总结若干机理，为理解和处理中美贸易摩擦提供了部分借鉴。与之相比，《日美政治经济摩擦与日本大国化》视野显然更宽广。不仅如此，该书对日美关系的考察系从国家间关系的本质属性出发，借鉴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但又不拘泥于此，力图以自己的独立思考补充和完善关于日美关系的理论构建。更重要的是，该书为国际关系史著作，使用了史料搜集、史实考察、脉络发现、机理探索 and 要义提炼等历史学方法，梳理和发现以 20

世纪 80 年代为主要研究时段的日美关系内在根本图景及其丰富含义。在此努力中，作者搜集和研读的相关人员回忆录、著述和笔记无疑跻身于最有价值和最令人感兴趣的素材之列，同时也令人对作者的考察和发现学术意义上的可贵信赖。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前 言

日美贸易摩擦是一种国际经济摩擦，日美为争夺国际资本主义生产结构中的优势地位，产生矛盾。美国在战后长期占据国际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领导地位，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消费、技术、贸易等关键环节。日本战后经济复兴，挑战美国经济霸权地位，威胁美国政治利益。美国重新改造日本，在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要求日本实行自由市场，政治、军事大国化。

一 美国霸权体系中的日美贸易摩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汲取孤立主义教训，建立自由主义霸权。美国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国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只会带来严重经济危机，并引发世界战争。为促进自由贸易，美国带领各国创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制定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简称《关贸总协定》），并向欧洲和日本开放市场，对其提供经济援助，接受欧洲和日本对美国商品歧视，承担保卫西方安全的费用。

（一）战后日美经济互补阶段

日本在战后奉行“重经济、轻军备”国策，在全球事务上接受美国领导，美国则默许日本自由进入世界市场，其中包括美国市场^①。美国为扶植日本，对日本实施门户开放，用低成本手段强化同盟关系。日美两国产

^① 肖佳灵：《日本对美外交的两难处境》，《复旦学报》1993年第5期，第102～108页。

业存在互补关系,日本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多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个时期美国经济政策是扩大两国贸易,强化同盟关系。美国要促进日本经济发展,乔治·凯南称“日本以资本主义方式复兴经济,是对共产主义扩散的有效防御”。当时美国政府担心日本为扩大贸易而与中国和苏联接近。因此,美国鼓励东南亚国家接近日本,扩大日本海外市场。

随着日美两国军事关系扩大,美国国防产业向日本贩卖大量武器,并从武器生产许可证交易中收取费用,补贴国内新产品开发^①。因此,当时的日美同盟关系有利于美国经济,有助于美国建立和平、稳定的亚洲秩序。美国意识到日本可能成为美国的经济竞争对手,但美国宽宏大量地对待日本,从战略高度看待日本崛起,给日本生存和发展空间。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安排,首先是保护日韩安全,日韩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成为美国的“保护国”;其次,美国引导日韩走向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日韩追随美国,实现国家安全和繁荣,也支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和军事霸权。

(二) 日美贸易摩擦升级阶段

日美贸易摩擦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当时日本廉价纺织品冲击美国南部纺织厂,许多工人失业。美国总统尼克松与日本首相佐藤荣作会晤时,要求日本对纺织品出口采取自主限制措施,佐藤敷衍了事,招致美国政府怨恨。1972 年尼克松访华,不事先通知日本,事件冲击波是佐藤内阁垮台的重要原因。但在冷战背景下,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认为日本的经济成长和社会安定,比美国国内特定产业利益更为重要,美国政府对安全保障问题的关注压制了国内对日本的不满。20 世纪 70 年代后半期,日美两国贸易关系继续恶化,在苏联咄咄逼人的进攻压力下,日美军事关系有所加强。1977 年卡特政府担忧经济停顿,利用日本受美国保护的弱点,向日本施压。经过数月紧张交涉,日本最终答应改善国际收支,降低进口

^① Michael J. Green & Patrick M. Cronin, "The U. S. - Japan Allianc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c., 1999, p. 156.

关税，并设定 7% 的经济增长率。

20 世纪 80 年代初，里根总统和中曾根首相相继上台，中曾根与里根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中曾根首相任职期间，从 1982 年到 1987 年是日美贸易摩擦最激烈时期。日美贸易摩擦模式是贸易问题政治化，贸易摩擦领域从个别产品扩展到整个产业，从产业问题发展为汇率问题，又从汇率问题发展为日本政治体制问题。美国采取的措施是要求日本自主限制出口，之后升级为在半导体等领域设定美国公司在日本的市场份额。美国处理日美贸易摩擦，依据的规则是美国霸权体系的自由主义经济规则，美国霸权体系规则是美国国内规则的扩展。美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贸易逆差主要原因是美国经济缺乏竞争力，美国产业升级不顺利，但美国让日本承担经济调整成本，强行要求日本遵守美国规则。

随着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增加，里根总统在贸易问题上受到来自议会和美国产业界的压力。里根政府在经济领域只得对日强硬，比如强迫日本自主限制汽车出口。1985 年美国采取决定性行动，逼迫日本调整汇率。美国联合英国、法国和德国与日本签订《广场协议》，在三年多时间里，日元兑美元汇率从 1 美元兑 240 日元升值到 1 美元兑 120 日元。1985 年日美签订《市场导向型分领域协议》（Market Oriented Sector Selective, MOSS），日本同意开放医疗器械、超级计算机、木材等市场。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日美重现紧张关系，苏联威胁逐渐消退，日本对美出口和投资额都急剧增长，美国媒体舆论调查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日本取代苏联成为美国的最大威胁。为制裁日本的贸易行为，美国国会在 1988 年通过《综合贸易竞争法》，强化“超级 301 条款”。美国贸易代表署根据该法律制裁日本等妨碍美国出口的国家。

美国认为“日本经济崛起破坏美国霸权经济基础，是以美国衰落为代价的”。日本实行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令美国深恶痛绝，日本经济政策源于日本独特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日本经济体系是日本官僚机构以“国家发展目标”为蓝图而精心设计的。日本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存在几个问题。

首先，日本国内资本主义经济是不成熟的，市场受到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等控制，为保护本国市场，把美国商品、服务和投资拒之门外。通产

省等官僚机构执行“重商主义”政策，以“行政指导”等手段干预市场，扶植本国幼稚产业，并重视大财团利益，轻视消费者利益。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世界金融业超越美国，世界最大十家银行中，日本独占2/3。日本大量并购美国科技公司，得到先进技术，却对美国封锁技术。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有半数以上议员来自农村，所以日本极力保护农产品市场，禁止进口美国大米，对柑橘、牛肉、谷物进口量设限。日本官僚机构像战前一样扶植财阀，形成三菱、三井、住友、丰田等三百家财阀，垄断日本市场。因此，日本在80年代成为经济大国后，日美之间贸易摩擦加剧。

其次，日本为保护本国市场，长期限制日元自由兑换，日元汇率长期低估，政府管制外汇，限制美国资本在日本金融和工业领域的投资。日本搭美国自由贸易便车，积累大量贸易顺差，成为战后美国自由主义霸权体系中最大受益国。美国经济产业缓慢地从工业升级到服务业，服务业单位产值雇佣的劳动力少于工业，而美国工业受到日本工业强有力的竞争。因此，美国失业人口增加，积累巨额财政赤字。

20世纪80年代，日本需要把挣到的美元重新借给美国，购买美国国债、公司和银行债券，填补美国经常收支账户赤字。因此，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日本则是最大债权国。这种经济共生关系增加了美国经济的脆弱性，一有风吹草动，美元汇率和美国股票价格都会暴跌。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幅度也扩大，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受到威胁的根基即美国经济霸权，也进而受到直接威胁美国霸权。

（三）日美处理贸易摩擦的措施

美国在日美贸易摩擦中采取的主要措施有：第一，联合欧洲与日本签订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在三年时间日元汇率从240日元兑1美元升值到120日元兑1美元，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日元汇率升值一倍多，在世界经济中都属罕见。

第二，美国督促日本扩大内需，减少贸易顺差，中曾根政府委派前日本中央银行总裁前川起草《前川报告》，提出日本应扩大内需，转换产业结构，扩大进口市场，改善市场准入环境，加快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日本开始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出现了经济的“两高一低”现象，即

日元升值（元高）、“高投资率”“低利率”局面。日本股票和土地等资产价格逐渐上涨，最终形成泡沫经济。

第三，美国强化“超级 301 条款”，1988 年通过以日本为对象的《综合贸易和竞争法》。法案规定美国贸易代表署每年提出贸易报告，指定不公平贸易对象国。在报告提出后的 21 天内展开调查，同时和对象国展开谈判，对象国必须在三年内废除不合理贸易壁垒，否则进行单方面制裁。美国贸易代表署在美国国会的强大压力下，对日本的木材、人造卫星等实施了制裁。

第四，美国贸易代表署在“超级 301 条款”框架之外还制定了《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Structural Impediments Initiative, SII），解决美日贸易和国际收支结构性障碍，即日本国内投标制度、市场分割、企业系列等非竞争性市场行为。在《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中，日本被迫向美国保证：（1）从 1990 年开始的 10 年中，对社会公共事业投资总额达到 430 万亿日元；（2）修改《大店法》，在流通领域把大型百货店开张审批时间控制在一年之内；（3）简化进口手续，把通关时间缩短到 24 小时以内；（4）在企业内部交易方面，由“公正交易委员会”在两年内对日本企业内部交易行为进行调查；（5）在排他性贸易惯例方面，保证尽快修改反垄断法，提高罚款金额；（6）把专利审批时间缩短到 24 个月。

1993 年克林顿入主白宫，他提出经济安全是冷战后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冷战时期的美日伙伴关系已经过时，美国担忧与日本的贸易逆差问题。他任命强硬的基米·肯特为美国贸易代表署首席谈判代表，美国认为美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中占有很高份额，唯独不能挤进日本市场，肯定是因为日本采取了非关税贸易壁垒和投资限制。因此，美国向日本提出在三年时间内，美国汽车、电信、医疗等产业在日本市场占有率应达到其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以此衡量日本市场的开放程度。日本反对美国的要求，指出美国设立数值目标，与关贸总协定规定不符。1994 年 2 月日本首相细川护熙访美，拒绝了克林顿的要求，日美贸易协商宣告破裂。美国参议院随即通过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强迫日本开放市场，克林顿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复活“超级 301 条款”，美国贸易代表署发表对日制裁清单。国会、总统、贸易代表署同时对日本施压。

虽然日美贸易摩擦激烈，但烈度始终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有几方面

原因。首先，里根和中曾根这两位强势领导人在国际政治上需要相互帮助，两位领导人在处理两国矛盾时表现出战略眼光。美国“携子之手”，指导日本朝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体制方向发展，日本以日本社会“亲子关系”模式，奉美国为“长辈”。里根总统坚持在里根－中曾根路线指导下处理两国贸易问题，里根是演员出身，脸部表情丰富，中曾根在日美首脑会谈中，观察里根面部表情，察觉里根会顾忌与中曾根的关系，不会在贸易问题上过分施压。在美国内阁会议上，每次美国官员提出对日强硬政策，里根总统都会说：“这对中曾根不好，我们还是放放吧。”美国最高领导人倾向于推动日美关系发展，缓和日美贸易摩擦。

其次，以中曾根首相为代表的日本统治阶层认识到日本经济体制需要改革，改革有利于日美关系巩固。中曾根多次向美国表示：“日本市场不开放，但日本正在改革，市场逐步自由化。”

最后，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表象背后，有耐人寻味的意义。美国对贸易摩擦的声讨，雷声大雨点小，表面上气势汹汹敲打日本。这是美国导演的“利用外压促使日本变革”的一出戏，日本统治阶层自身也有借助日美贸易摩擦促进国内改革的内在要求，一导一演，各取所需。戏剧的主角是日本，日本各省厅利用美国压力，迫使日本利益集团让步，改变日本社会行为规则。所以，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是日本利用外压进行国内改革的好机会，日本充分抓住机会，既在经济领域实施“规制缓和”，引进竞争机制，遂行新保守主义市场改革，也改革国内政治，以实现日本的政治、军事大国化目标。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改革选举制度，实行小选区制，形成两大保守政党制。因此，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发生在日美权势转移时期，日美间发生摩擦是必然的，贸易摩擦掩盖政治、军事、文化摩擦，以及日美间国家权力变更引发的国际权势斗争。

二 日美政治体制摩擦与日本政治大国化

（一）日美政治体制摩擦

20世纪80年代，美国亟须把日本经济体制改造成开放的、自由竞争

的市场经济，并把日本政治体制改造成资产阶级民主政体。战后初期，美国设计日本政治体制时，曾设想日本实行美国式总统直接选举，政党体制是保守两党制，但美国认为日本政治发展要循序渐进，在日本实行英国式议会内阁制。自民党在“55年体制”下连续执政38年，日本资产阶级民主政体有严重缺陷，三权分立体制不健全，与非市场导向经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

1. 自民党一党集权与市场保护

自民党一党集权，与财界和各利益集团形成共生关系。财界和利益集团给自民党提供政治资金，换取政府基建合同和政府预算资金，官僚和财界主导社会利益分配。自民党利用政府权力控制经济领域，保护国内市场，如流通领域为自民党的一大票源，为保护城市中小零售商，自民党制定了《大店法》，规定大型百货商店在设立前必须向中小零售商咨询意见，如果中小零售商反对就不能开设。《大店法》的规定使美国大型百货商不能在日本开店，美国商品必须由日本公司代理。在建筑领域日本政府规定凡是投标公共设施，必须在日本有八年以上建筑经验，而且投标是不公开的，由政府根据报价、建筑经验、建筑计划等确定。美国建筑公司本想参加大阪关西机场建设，也因为这些规定不能中标。在金融服务领域，大藏省严格控制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开设，连银行招牌设计都要插手，美国华尔街金融巨头无法染指日本市场。自民党的另一大票源是农民，日本农协是日本最大的利益集团，到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还拒绝进口美国大米。1991年美国大米种植协会会长带大米种子参加日本农产品展览会。日本农林水产省马上要求他撤去展台，否则就派警察逮捕他，事后美国大使馆强烈抗议日本的行为。

“55年体制”下的日本政治体制是自民党在各利益集团和阶层分配利益的政治，是封闭、排他的政治。这种制度的封闭性是日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这种制度的内向性还是日本在国际政治和军事领域“免费搭车”的主要原因，自民党只顾在国内分配利益，完全抛弃自民党建党纲领中的“修宪”和“独立自主”等主张。因此，日本保守派政治家主张两大保守政党轮流执政，强化日本政治中枢的权力集中，实现日本的“正常国家化”。

日本保守派政治家认为,日本要实现美国式两大保守政党制,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首先要改革选举制度。20世纪80年代日本实行的是中选区制,全国有130个选举区,每个选区按人口比例分别选举3~6名议员。这种选举制度产生了一个无所事事的在野党——社会党,日本选民中总会有20%~30%的人反对政府政策。所以,社会党在每个选区,不费力气就可以有一名候选人当选。比例代表制的实行更加分散选票,形成小党林立局面。自民党得以成为“万年执政党”,社会党成为“万年在野党”,两党表面上相互竞争,背地里却相互勾结。在自民党干事长办公室里就设有金库,按不同法案给社会党一定金钱,收买社会党。

这种选举制度迫使候选人之间分配选票,政党要在众议院过半数,必须保证每个选区有两名以上候选人当选。日本自民党采取的选举策略是向利益集团输送政府资金,以便容易在候选人间分票。比如,有的自民党议员引入道路、桥梁等工程,其他自民党议员引入铁路、开垦和筑坝等公共工程,使当地公司和居民受益,同时在同党候选人间分配选票。

日本社会封闭的利益循环产生封闭市场,日本政府市场保护政策招致美国报复,影响到日本大出口商。例如美国为打开日本农产品市场,限制日本电器和汽车进口。这使日本财界对日本“非市场导向型”资本主义经济感到非常烦恼。所以,这些大出口商要求政府改变保护市场的政策,这对自民党来说是一个巨大灾难,给自民党带来巨大压力。自民党过半数议员从农村选区选出,不能抛弃农协利益,自民党政治家金丸信曾声称:“日本要继续大量出口汽车,只能开放农产品市场。”城市商业、零售业和农协是自民党的稳固票源,但自民党大部分献金来源于财界。自民党内改革派倾向于小选区制,选举时依靠政策竞争,而不是给特定利益集团输送资金。随着日本的城市化发展,城市选民占选民多数,带有农村政党特征的自民党必须城市化,跟上日本社会发展的步伐。城市选区多数是流动票(浮动票),自民党议员个人后援会不能覆盖流动性强的城市人口,只有依靠政策竞争,自民党才能保持政权。所以,自民党内一部分议员要求实行小选区制。

2. 日本小选区制改革

日本小选区制改革是在几个条件成熟后实现的。首先,自民党内改革

派与保守派发生分裂，小泽一郎与小渊惠三争夺“经世会”控制权时失败。1993年自民党内亲美改革派小泽一郎率领小泽·羽田派退出自民党，投票支持社会党等在野党对宫泽喜一政府不信任案，自民党结束38年的单独执政局面。1993年新党党首细川护熙联合所有在野党，建立新政府。新政府在国会通过选举制度改革法案，日本选举制度改为小选区和比例代表并立制。具体操作是，把全国分为300个小选区，每个选区选举一名众议员，余下的200个议席按人口比例分配给北海道、东北、北关东、南关东等11个比例区。1996年10月首次在新选举制度下产生了国会。

其次，自民党一党集权，腐败丛生，国民希望政权交替。为了实现两大政党轮流执政，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借鉴英美议会选举制度。小选区制的特点是容易实现政权交替，在小选区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选民情绪些许波动，政权就会交替。

最后，日本保守派政治家推动小选区制的实行，是为了实现保守主义集权。冷战后，随着苏联解体，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社会党迷失方向。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借助冷战后国际形势，争做国际政治大国。社会党是日本主要护宪派，阻碍日本保守派政治家修改和平宪法，向海外派兵。因此，实行小选区制可以瓦解社会党，形成美国式两大保守政党轮流执政的政党体制。

而且，美国在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利用日本国内政治条件变化，促进两国政治体制融合。日美贸易摩擦引发日本国内政治斗争，日本战略派政治家要求维护日美同盟，在美国帮助下实现日本“正常国家化”。美国拉拢日本战略派政治家，在日本推行政治改革，引入小选区制。

小选区制废除在一个选区选举多名议员的制度。小选区制规定每个选区只选举一人，在同党候选人之间不必分配选票。候选人以施政方针作为竞争手段，所以城市中产阶级政策取向可以反映到政治决策中。自民党式的大型政党在小选区占尽优势，右翼小政党面临联合组建大政党与自民党竞争局面，在这种形势下占社会支持率30%左右的左翼政党会土崩瓦解。日本政党制逐渐走向自民党和民主党两大保守政党制，这正是美国希望的。战后，美国决定日本实行英国式议会内阁制，但英国有两大政党工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日本自民党却一党集权。冷战结束后，美国积极支持

日本“改革派”政治家，促成日本政治制度改革。

3. 日美政治体制融合

日本政治改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中曾根阶段、小泽阶段、小泉阶段，三者反映各自的时代条件。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保守政治的改革”，即以保守政治为前提，又紧跟时代步伐，积极变革，实现更完美的保守政治。其共同理念是树立小而强的政府，提高日本在国际环境中的适应能力，恢复日本的活力和独立自主性。

日本改革进程与西方政治改革紧密相连，是日美政治体制融合的重要一步。里根、撒切尔、中曾根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新保守主义改革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小政府大社会。政府努力提高民间活力，放宽政府管制，实施国企民营化。撒切尔夫夫人粉碎工会罢工，恢复工厂秩序，中曾根也通过国有铁路民营化，消灭国有铁路工会。

小泽阶段的改革主要是在日本实施小选区制，实现日本两大保守政党制，日本政治体制逐渐与美国政治体制融合。小泽提出中央政府把外交和军事以外事务下放给地方政府，废除过度的政府规定，给民间活力，强化首相权力，提倡“小政府、强政府”。

小泉阶段是新自由主义改革阶段。新自由主义是21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政治改革。小泉打着“解体自民党”、打倒“抵抗势力”的旗号上台，试图打破日本利益集团政治。他精简政府机构，提出“从官到民”的口号，对邮政、道路公团等实施民营化。小泉时期“小政府、大社会”改革是发挥民间力量的改革，民间企业能做的让民间企业去做，让市场规律发挥作用。政府只管民间企业做不了的社会保障、外交、军事等事务。

中曾根、小泽和小泉的改革，是日本跟随美国政治改革步伐，在日本实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改革，加速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的“美国化”进程。在日美贸易摩擦中，随着日本自由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的发展，美国对日贸易和投资迅猛增加，日美矛盾也逐渐缓和。

（二）日本政治大国化

20世纪80年代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急于成为政治大国。1982年中

曾根首相上台是在“日本要求大国化时代，出现的领导日本大国化的首相”。日本政治大国化成因有内在因素也有外在因素，其内在因素首先是日本经济大国化后，富裕的日本国民要求国际地位和国际规则制定权；其次是日本资产阶级在海外投资，需要政治和军事保护。

其外在原因是日美贸易摩擦引发两国关于日本“国际贡献”的争论，美国认为日美贸易摩擦是日本在国际事务和军事领域免费搭乘美国便车，美国承担过重负担，影响美国经济竞争力造成的。因此，美国要求日本做出更多“国际贡献”，承担更多防卫责任。日本政府的外交战略是日本积极做“国际贡献”，取代中国在美国心目中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认为中国在美苏对抗中有决定性影响。

中曾根为加强日美关系，增加每年给予驻日美军的“友情预算”^①；部分解禁“武器出口三原则”，向美国输出武器技术；同意参加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增加日本国防预算，突破国防预算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的限制；向美国承诺自主防御东京以南1000海里海上运输线。中曾根承认日美同盟为军事同盟，加强日本军事实力，借船出海，打着“国际贡献”旗号，实施日本“国防”正常化。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沃尔福维茨在1984年向国会作证，“美国政府官员和学者都认为当今美日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②。1987年中曾根内阁把军费开支提高到GNP的1%，按外汇牌价计算，日本军费占世界第三位。日本除了分担美国军事负担外，还对美国盟国实施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加强对菲律宾、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经济援助。

日本政治大国化也引发美国担心，美国要控制日本，让日本为美国自由主义霸权服务，这也是美国改造日本的初衷。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势力扩张到中国及东南亚等国家，控制亚洲资源和能源，在亚洲建立日本式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日本在亚洲生产基地，将高质量商品廉价卖给美国。日本排他性区域安排，会排挤美国在亚洲建立的霸权，损害美国政治、军事及商业利益。日本适用于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模

① 思いやり予算，友情、朋友预算。

② 『外交フォーラム』、1987年5月、35頁。